

高阳◎著



翁同龢

下



高阳借翁同龢这位两朝帝师、政坛枢纽六十年政坛浮沉为主线，以丰富史料，揭秘罕为人知的宫廷内幕、官场定律，全面还原甲午战争、戊戌政变历史真相！

高阳◎著

翁同龢

下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录

下册

11	黄海燿师	1
12	求和终得和	18
13	回纥马与督亢图	52
14	穷极思变	75
15	“独坐看雨”	100
16	戊戌政变	121
17	山中岁月	168

附录	十疑康有为诗并注	214
----	----------	-----



11 黄海燔师

翁同龢天津行

八月十八日是李鸿章平生最痛苦的一天，外则黄海大败，内则廷臣交诟，翁同龢是日记云：

辰初，上至书房，发看昨日三电。戌刻一电，则平壤告不能守，云敌高山架炮俯击，人马糜烂也。旋至枢曹会看事件，兰翁抗论，谓合肥有心贻误，南皮与争，他人皆不谓然。余左右其间曰：“兰翁正论，合肥事事落后，不得谓非贻误。”乃定议两条：一严议；一撤三眼花翎、褫黄马褂。恭候择定。写奏片，寄谕叶志超，令与聂士成前后夹击，疏通后路；明发切责李鸿章。二道午正一刻递，未初二刻发下，李鸿章处分用拔去花翎、褫黄马褂一道，遂散。

黄马褂无足为奇，三眼花翎则为殊荣，“中兴名臣”中唯李鸿章得膺此赏。《清史列传》本传：



翁同龢(下)

(光绪)十九年正月,鸿章年七十,慈禧皇太后御书“调鼎凝釐”匾额;“栋梁华夏资良辅,带砺山河锡大年”对联;“福寿”、“益寿”字;御笔“蟠桃图”;无量佛,带素貂褂诸珍物……二十年皇太后六旬万寿,赏戴三眼花翎。

慈禧六十万寿恩典,颁于是年正月初。照定制,贝子以上始得戴三眼花翎;李鸿章封伯爵,则膺此懋赏,无异表示他的地位高于公爵。但拔去三眼花翎,羞辱犹不及褫去黄马褂,因为有战功始得蒙此赏,则褫夺黄马褂,即有否定其战功的意味在内。

海战大败的消息,翁同龢次日始知,为张荫桓所面告。其时翁同龢正在病中,发高烧、牙痛,得此噩讯,“益觉肝火上炎”,二十日遂未入直。二十一日记:

本定请假五日,昨莱山函云,上趣令出。时事如此,岂敢即安,遂撤不递。而自今日起通融两日,看病势何如。樵野来长谈,以洋磅见商,不得不见也。连日军情水陆如此:鸭绿一线可危,即渤海亦可危。庆王请带兵赴九连城,而以沙克都林机布、桂祥为副,未知准否。志锐折未下。

庆王自请带兵赴九连城,防备日军渡鸭绿江,侵入“龙兴之地”,是联络蒙古藩部王公,及受恩深重的承恩公所表现的一种姿态。是日又有一条极重要的记事:

庆王、礼王并见慈圣起,此后连日如此。

这是慈禧在光绪朝第二次垂帘的开始。而翁同龢疾又大作，请假多日，德宗既无可以商酌之人，而枢廷、译署多承太后意旨，因而慈禧独断独行，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两佐军饷；六十万寿停办点景、经坛、戏台诸事；原定在颐和园受贺，改在宫中。此皆德宗所愿而不敢请者。

至八月廿八日，翁同龢销假即奉懿旨召见。先到书房，德宗示以两折，始知军机全班请辞，自然不准；另一折为南书房翰林李文田等请起用恭王。翁同龢记与李鸿藻一起召见事云：

会李公同入，皇太后、皇上同坐。首言倭事，次言淮军不振，并粮械无继，种种贻误状。

皇太后曰：“有一事，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，此不能书廷寄，不能发电旨者也。”

臣问何事。

曰：“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，今喀使将回津，李某能设法否？”

臣对：“此事有不可者五，最甚者，俄若索偿，将何畀之？且臣于此等始末无闻，乞别遣。”叩头辞者再，不允。

慈禧的意向是很明白的：准备联俄以谋和。但谋和则必须主战派同意，领导清议者翁同龢、李鸿藻，翁又较李得势，因此，派翁同龢与李鸿章会商此事，如有结果，则翁、李皆有安抚朝士之责。舆论不致过分情绪化，和议始可望有成。此为李鸿章与庆王商定的办法，而由慈禧出面主持。证据是慈禧面谕“喀使将回津”——俄驻华公使的行踪，总署亦未必知道，深宫太后何由得知？明明为李鸿章所透露。



翁同龢(下)

以下有一段交换的话,注定了甲午之后悲惨的结局:

(慈禧)最后谕曰:“吾非欲议和也,欲暂缓兵耳。汝既不欲传此语,则径宣旨,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;朝廷不治以罪,此后作何收束?且退衄者,淮军也,李某能置不问乎?”

此谕态度已有改变,问“李某能设法否?”则为衔命与李鸿章去谋和。问“此后作何收束?”则纯粹是传旨,是和是战,要听了李鸿章的意见再议,并无损于翁同龢的立场,因而接下来的对话如此:

敬对曰:“若然;敢不承?”

则又谕曰:“顷所言作为汝意,从容询之。”

臣又对曰:“此节只有李某复词,臣为传述,不加论断。臣为天子近臣,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。”

允之。

丧师辱国,种种贻误,而朝廷可“不治以罪”,则纪纲何存?因此,慈禧有“所言作为汝意”之谕;而又谓“从容询之”,仍是希望翁同龢能平心静气地跟李鸿章谈出一条结束战争的路子来。因此翁同龢立即声明:只传述,不论断。同时再一次表明了反对议和的立场。

以下又记另一大事云:

既而与李公合词吁请派恭亲王差使,上执意不回,虽不甚怒,而词气决绝,凡数十言,皆如水沃石。

此“上”指德宗，非慈禧。请复起恭王，原为李文田的建议；德宗在书房先已示翁，如不以恭王复起为然，则翁李根本就不必“合词吁请”。于此可知，“上执意不回”，是翁同龢所教，因为慈禧不喜恭王，所以德宗“虽不甚怒，而词气决绝”，仿佛先意承志，以示孝顺，实际上是表示，他虽赞成复起恭王，但须得太后一言而定。“思出自上”的警惕，为以下事上之道。但慈禧此时仍旧希望用翁同龢，如果翁同龢肯听话，慈禧绝不会再用恭王。此中之理，至为微妙，慈禧之保持沉默，即是此时尚未能正确评估翁同龢到底是何态度之故。

翁同龢衔旨秘密赴津，经两日途程于九月初二上午面晤李鸿章，日记甚详：

见李鸿章，传皇太后、皇上谕慰勉，即严责之。鸿章惶恐，引咎曰：“缓不济急，寡不敌众，此八字无可辞。”

复责以水陆各军败衄情状，则唯唯而已。

余复曰：“陪都重地，陵寝所在，设有震惊，奈何？”

则对曰：“奉天兵实不足恃，又鞭长莫及，此事真无把握。”议论反复数百言，对如前。

李鸿章的态度是非常明白的，打下去非败不可，但“缓不济急，寡不敌众”八字虽“无可辞”，而责任亦不全在他一个人肩上。至“奉天兵实不足恃”，更与北洋无关。翁同龢犹思振作其气，反复议论，无奈李鸿章疲、软、滑三字俱全；朝廷倚为柱石干城者如此，翁同龢依然执持不和的主张，实不能辞书生误国之咎。

其时适有廷寄，谕李鸿章及翁同龢，谓闻喀希尼日内到津，李鸿章如



翁同龢(下)

与晤面，可将详细情形告翁，回京复奏。朝廷仍望翁同龢能与李鸿章商略如何请国际斡旋谋和之意，殊为明显。因此，翁同龢首先以虚言恫吓，企图使李不敢与喀希尼谈和，日记如此：

余曰：“出京时曾奉慈谕：现在断不讲和，亦无可讲和。喀使既有前说，亦不决绝。”令不必顾忌，据实回奏。

李云：“喀以病未来，其国参赞巴维福先来。云俄廷深恶倭占朝鲜，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，俄亦不改前意。第闻中国议论参差，故竟中止。若能发一专使与商，‘则中俄之交固，必出为讲托’云云。”又云：“喀与外部侍郎不协，故喀无权。”

余曰：“回京必照此复奏。余未到译署，此事未知利害所在，故不加论断。且俄连而英起，奈何？”

李云：“无虑也。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”云云。

谈论到此结束。翁同龢当日启程回京。此行在翁一无所获，对李鸿章不能发生丝毫影响，反而无形中受到李鸿章的警告。巴维福所言，真假不可知，但借巴维福之口，谓“闻中国议论参差，故竟中止”，隐然表示，如俄国人不肯任调人，以致和局不成，则翁同龢应负责任。这是翁同龢与李鸿章第一回正式打交道，翁非李之对手，彰彰明甚。

恭王复起

当翁同龢赴津途中，朝局已有变化，九月初一日上谕两道，第一道云：

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：本日召见恭亲王奕訢，见王病体虽未痊愈，精神尚未见衰。着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，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，会同办理军务。

第二道仍是奉懿旨，恭王“着在内廷行走”，亦即慈禧随时可召见恭王，恭王亦随时可以“请起”。

恭王闲废十年后，终于复出。翁同龢、李鸿藻合词吁恳而不允，乃特颁懿旨，主持洋务，这是宣示中外，恭王为后党而非帝党。同时此亦表示，慈禧对翁同龢已经失去信心。朝局至此，壁垒分明。恭王为英法联军内犯，主持和议之人，他之复起，并管总署，慈禧的意向如何，非常明白。另一方面则有九月初七日，翰林三十五人连衔折、张謇以议官身份单衔折，以及九月初八志锐折，非主战即参李鸿章。恭王议和的活动，据翁同龢所记如下：

九月初九日：令恭邸今日传赫德面询一切，昨志（锐）折，请联英伐倭，欲以二三千万饵之。赫云，不能。文廷式等三十八人折，大致如志折。

九月初十日：恭邸有起，大抵着重赫议，余坚不与同也。

九月十六日：诣枢曹，始知昨日英使欧格纳到署，议各国保护，限即日定议，飞促恭邸到署，议至亥正散。日本索兵费，至是发露矣。邸既入此言，孙徐汹汹，以为不如此不能保陪都、议山陵，余与李公谓英使不应要挟催逼，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拒之？俟俄使到（北洋来信，喀希尼昨晚起身来京）再商。孙、徐不可。

午初，恭邸见起五刻，余与李公同起二刻五分，军机起三刻。余



等见皇太后，指陈欧使可恶，且所索究竟多少，如不可从，终归于战。宜催各路援兵速进，悬爵赏以励；九连城前敌催海军修好六船，严扼渤海，此二条允行。论款事语极长，然天意已定，似不能回矣。归而愤憾，求死不得。噫！

所谓“天意”，指慈禧太后决定谋和，而谋和之一大目的，在希望十月初十万寿能照常庆贺。翁同龢九月廿一日记：

昨日内奏事处口传，奉旨：“所有应进皇太后六旬万寿贡物之王大臣，以及外省各大臣等，均着于本月二十五日呈进；其蒙古王公等，于二十六日呈进，俱入福华门。钦此。”于是群议纷纷，那枢臣亦欲进矣。余与李公同曰：至敬无文。盖遵十八年懿旨，凡贡物绸缎，均毋庸呈进。众皆谓然，唯礼邸尚犹豫。

其实，“礼邸尚犹豫”，还是表现了真实的态度；“众皆谓然”的军机大臣则完全是敷衍翁同龢，第二天悄然进贡，“初犹秘之”。在这件小事上，充分反映了枢廷、译署中，颇有人认为翁同龢不可理喻，采取了表面尊重，暗中自行其是的办法。但翁同龢亦并无坚持己见的决心，与李鸿藻等人，仍旧也托立山代为办了贡物，于九月廿五日进呈。

其时慈禧六十万寿之期日近，倾向于太后者，谋和甚亟。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九月廿三日记：

闻本月十四日，枢臣某嗾其乡人联衔递议和说帖于恭邸，为瑞景苏前辈所劾。

瑞景苏名瑞洵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光绪十二年翰林，其时官国子监司业。九月廿一日以编修戴兆春等十四人上书恭亲王主和，瑞洵奏请严旨申诫，以杜莠言乱政。戴兆春字青来，杭州人，光绪三年翰林，其祖即戴熙，字醇士，官至兵右，以画受知于宣宗。咸丰庚申，洪杨初破杭州，戴熙殉难，谥文节。所谓“枢臣某”，无疑地是指徐用仪。

由于主战的论调始终高唱入云，和议没有人敢谈；备战则无完整计划可言，同时进行万寿庆典占据了王公大臣大部分的时间，而就在这扰攘不定、一团混沌之际，日本山县有朋所统率的第一军，于九月二十五日自朝鲜义州渡鸭绿江，进占安东九连城；十月初一陷凤凰城。同时大山岩所统率的第二军，下辖一师团、一混成旅亦渡江后续而至。局势发展为中日因朝鲜发生冲突，一变而为日本直接进攻中国，而且很快地就站定了脚步。数日之间，便使得朝廷处于“战难，和亦不易”的至为艰窘的境地了。

这时政柄归慈禧独持，十月初四纳庆王之议，命恭王督办军务，庆王帮办，翁同龢、李鸿藻、荣禄、长麟会同商办。荣禄本为西安将军，入京祝嘏，适逢恭王复起，代福锃而为步军统领。他之参与会办军务，一方面是他负责拱卫京畿的地位使然，另一方面负有为慈禧作耳目的任务。

十月初六，政府改组，翁同龢、李鸿藻复入军机；额勒和布、张之万休致。军机处另有一新人——广东巡抚刚毅。

自种祸根

刚毅字子良，满洲镶蓝旗人，原是个通满文的笔帖式，同治五年绩优议叙，升为主事，分发刑部。刚毅是书办的材料，熟悉例案。清朝的刑名，



最讲究“例”，叫做“无例不可兴，有例不可灭”，但司官每不屑描意于此，以致书办得以舞文弄法。刚毅能在例案上下工夫，难得一见，因此当光绪元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时，对刚毅颇为赏识，派为“秋审处总办”；此差一共八员，主持“勾决”，权威甚重，是个优差。光绪五年补郎中，复以京察一等，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，六年外放为广东潮嘉惠道，七年擢江西臬使，转直隶；未几调广东藩司，再调云南；十一年升任山西巡抚，十四年调江苏，十八年调广东，二十年特旨召来祝嘏，于九月间到京。

刚毅在仕途中，可说一帆风顺。他跟翁同龢的关系很深，亦颇得翁同龢的照拂，每次到京，必有几次长谈；翁同龢亦常为人写八行，在刚毅处有所关说，但从不受他馈赠。刚毅之入军机，为翁同龢所特保，因为翁认为他是“结实人”、“清廉明快”，想用他来整饬纪纲，不想后来他“整”了翁同龢。

刚毅的笑话甚多，大致《官场现形记》中形容念白字的笑话，都曾在他身上发生过，如称皋陶为“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”，陶字且念作本音；狱囚瘐毙，辄改“瘐”为“瘦”。入军机后闹了个大笑话：四川奏报剿番夷获胜一折，内有“追奔逐北”一语，刚毅大为不满，谓川督漫不经心，奏折中有错字，打算请旨申饬，请问其故，他说：“这‘追奔逐北’，一定是‘逐奔追比’之误，番夷奔逃，逐者捕获，追比他所劫汉人财物。如说是‘逐北’，莫非不会逐东、逐南、逐西，一定非向北不可？”

他的同事以及军机章京，都想笑而不敢笑；只有翁同龢是荐主，面子上挂不住，当时以略带申斥的语气为他纠正谬误。据说刚毅后来不顾多年照拂之情，要攻倒翁同龢而后快，就因为有此一段无端结下的仇恨之故。

翁同龢复入军机之初，正当慈禧六十万寿“花衣期”开始之时。所谓

“花衣”，为蟒袍之俗称，遇有大庆典，朝官够资格着蟒袍者，均须穿着，“前三后四”，包括庆典正日在内，一共七天，称为“花衣期”。

时事如此，而慈禧依然演剧庆贺，德宗颇不以为然，翁同龢十月初九日记：

未明见起，五刻退，语极长、极切、极细密也。午初二刻诣宁寿宫听戏，入坐六叩，谢皇太后御笔“久寿”一幅、大小荷包一对，即退，饭。饭罢出至方略馆小坐，遂至巡防处，两邸在焉。是日稍发议论，略办数事。上召对枢臣时垂谕极急，并云不可早散。又云听戏三日，诸事延搁，尽可不到也。派出臣龢明日进午餐，李鸿藻晚膳，刚毅十一日早膳。费库平足纹一百二十两，另八两。

花衣期中，近臣排日进膳，以示孝敬；“折乾”交内务府代办，故有费银一百二十两之记。“巡防处”则为督办军务办公之处。翌日为太后万寿正日，翁同龢记：

是日无封奏、无外折。巳初二毕，同诣皇极汀外敬俟。王公在宁寿门阶下，皇上于慈宁门门外。巳初驾至，步行由西门入，升东阶，皇太后御皇极殿，先宣表，上捧表入宁寿门授内侍，退出门，率群臣三跪九叩，退换衣，巳正二刻入坐听戏，刻许遂退。

宁寿宫为高宗内禅后颐养之处，慈禧由慈宁宫移居于此，示人以太上皇训政的印象。是日大连告警，至半夜复有急电，翁同龢十一日记：



翁同龢(下)

子正有叩门者，乃荣金吾送信，为之惊起，盖旅顺警电也，遂不寐。照常入，电报纷至，金州已失矣。已正入座听戏，叩头毕即退，实坐不能安也。方略馆饭，再诣听戏处，适盘赏，乃谢赏，三叩而出。诣巡防处，见北洋丑刻电，南岭关已失，徐邦道败退，旅顺仅半月之粮，此绝证矣。仍发电令合肥速援，毋坐视。谈密事直至黄昏。

“荣金吾”谓荣禄。步军统领犹如汉朝执金吾，故以此相称。至所谓“密事”，则议和，翁同龢十二日记：

退后闻宁寿宫叫起，恭邸奏昨事，太后遍询臣等，臣对释疑忌则可，其他未可知，且偏重尤不可，盖速鸡不飞，亦默制之法。凡四刻乃退。是日恭奏对语颇杂，不得体，余不谓然。

此段日记，翁同龢晚年已加删改，语意暧昧，但知为谋和。翁同龢接前又记：

出至直房，孙、徐拟密寄，自书之，不假章京手。待递下未初三刻矣，余携之赴督办处，两邸咸在，樵野亦来，当面交讷。申正余与邸语不洽，拂衣先归。

据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》，是日“以金州失守，太后命张荫桓赴津晤李鸿章，商邀各国调停”。因此可知：

- 一、翁同龢之所谓“偏重尤不可”，指俄国而言。
- 二、孙、徐即军机中主和最力的孙毓汶、徐用仪。“拟密寄”，即下达

李鸿章的“廷寄”。

三、“樵野亦来，当面交讠”，即以“廷寄”交张荫桓，携往天津面交李鸿章。

四、“与邸语不洽，拂衣先归”，自是因和战各持己见之故。此“邸”当指庆王。翁同龢对恭王颇为尊敬，且年龄亦相仿佛，即令“不洽”，不致有“拂衣”的过当举动。

张荫桓赴津晤李鸿章后，李有复奏，主加意笼络俄、英、法，而且仍旧深信，“稍迟俄当有举动”。至于张荫桓何日回京，如何复命，翁同龢记而删去。唯十月十三日所记保存，实为史笔。记云：

言者请下罪己诏，上深黻之。

臣进曰：“此即盛德，然秉笔甚难，假如土木、宦官等事，可胪列乎？抑讳弗著乎？讳则不诚，著则不可。宜省中留览，躬自刻责而已。”余所陈甚多，同官舌桥。

“土木”指颐和园，“宦官”指陈莲英。“余所陈甚多，同官舌桥”，可以想象，翁同龢针对慈禧，大发了一顿牢骚。恭王歿后，翁同龢即被逐，实种因于此日。

其实李鸿章因奉有密旨，正式展开和议，先派洋员德璀琳赴日试探，而有一极荒唐的举动，翁同龢十月十六日记：

是日见合肥致两邸书，谓德璀琳请头品顶戴，已权宜授之，可诧也。

李鸿章亟谋求和，且深知慈禧太后亦复如此，故悍然做此年羹尧所不敢做之事，自是有恃无恐，但手段实甚拙劣，如德璀琳果然有用，且有所要



挟,不妨酬以重金,而不可假以名器,因为这一来无异向日本示弱。对付日本最宜避忌的一着便是示弱,适足以启其得寸进尺的野心。

宫闱多故

很显然地,慈禧的威望,此时已遭到极大的挑战,庙堂如此,宫内更为尖锐。未几而有珍妃被黜之事;翁同龢十月廿九日记:

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,先问旅顺事,次及宫闱事,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,即降旨降为贵人等语。臣再三请缓办,圣意不谓然。是日上未入座,因请问上知之否?谕云:“皇帝意正尔。”命即退,前后不及一刻也。回直房,余与莱山拟稿,似尚妥协。

记下又叙处置不法太监事:

鲁伯阳、玉铭、宜麟皆从中官乞请,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,未果,内监永禄、常泰、高姓皆发,又一名忘之,皆西边人也。

“皆发”谓配发吉林;“西边”指陕甘。其中裕宽一案,与珍妃有关。据清人笔记,裕宽所营者为四川总督,先谋之李莲英,索贿过巨,不谐。裕宽为珍妃家亲戚,由太监高万枝媒介,珍妃为之乞请于帝。李莲英侦知其事,面奏慈禧,因召珍妃诘问,珍妃坦承此事,并谓:“上行下效,不是老佛爷开端,谁敢如此?”慈禧震怒,行家法杖责,先朝妃嫔及恭王之女大公主